

1956年青创会代表邓友梅：

文学路上的三个脚印

□本报记者 刘秀娟



1956年，站在悬崖边上

这一年，25岁的邓友梅接到了北京文联的通知——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这时候，《在悬崖上》还只是个一闪而过的念头，没有动笔。“在会上受到鼓舞和启发，我决定把它写下来”。邓友梅回忆说，大会的气氛很热烈，有种欢欣鼓舞的精气神。茅盾、周扬等名家的报告，让他既有一种亲切感，又在思想上得到启发和帮助。无论是名家的报告，还是年轻人的发言，都围绕着文学创作非常具体的问题，谈思想，谈结构，谈技巧，让他直接想到自己的创作，该怎么写，该往哪儿发展。

在此之前，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已经先给北京的几位代表开了个预备会，嘱咐大家这个会议很重要，到会上要好好学习，“但是仍旧没有意识到有这么重要，到了会上很意外”。在会上，和绝大多数代表一样，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原以为总理很严肃，没想到非常亲切，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像对小朋友似的，没有官味。”邓友梅说。

会议的细节邓友梅已经想不起太多了，虽然非常想配合我们的采访，但是老人吃力地回过身去，也看不清岁月之河对岸的往事了，毕竟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

会议结束之后，邓友梅写出了《在悬崖上》。当时，他在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工作。1955年，从中央文学讲习所毕业的邓友梅认为“作家待在文化机关里是不会有出息的”，要“深入生活，积累生活”，就要到工人中间去。他选择了三建，想法直观而简单——“建筑公司，建设新中国”，这是一个可以为新中国挥洒汗水的地方。《在悬崖上》的主人公“我”，便是建筑设计院的一名技术员。

《在悬崖上》带给邓友梅璀璨夺目的光环，但是，谁都无法预料，它也是一次告别演出。此后邓友梅被迫停笔22年。青创会的振奋，创作上的巨大进步，以及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的激情，刚刚点燃了邓友梅的青春，他的人生，却已经另起一段了。

1978年，追赶队伍

邓友梅是在茹志鹃的鼓励之下，才燃起了积压多年的创作激情。

“有积蓄力量的时间，就一定有使用力量的时间。”《话说陶然亭》里的将军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依旧在内心默默地积攒力气，他怕有一天，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自己什么用处都没有了。邓友梅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情一定特别复杂。

“文革”后，45岁的邓友梅作为“退休”人员回到北京，生活境况很不好。当年的老大姐茹志鹃来看他，聊了半天，邓友梅要去做饭，觉得茹志鹃无事可干，便顺手把自己写的一些闲篇拿给茹志鹃，让她解闷。没想到茹志鹃看了陈毅元帅的一篇，敦促邓友梅修改后发表。邓友梅多年不写作，改得并不顺利。“来来回回，重写了好几遍，其实，以茹志鹃的水平，她自己帮我改一下是很容易的，但是她一定让我自己改。”邓友梅知道茹志鹃的良苦用心，她就是要逼他磨掉笔头的锈迹，重新找到写作的感觉。

这篇小说就是发表于1978年的《我们的军长》，随即荣获1980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邓友梅的创作热情重新被点燃了。《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等作品连续获奖。

邓友梅的青年时代，并没有写出多少作品，但是正如“将军”所说：“革命者只有积蓄力量的时间和使用力量的时间，哪有供消磨的时间呢？”那些艰难而痛苦的年轻岁月，终归以另一种形式，走进了邓友梅的作品——“天天和工人打交道，听他们谈天说地，给了我另一双眼睛，那是普通百姓的眼睛，从他们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和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

1982年，找到自己的路

复出后的邓友梅一直琢磨创作上如何才能突破。他感觉到自己并不年轻了，可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再把乏善可陈的故事交给读者，他不甘心。这个时候，很多老作家都“归来”了，更年轻的作家也崭露头角了，邓友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学创作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走得通。“一个很直接的比较，王蒙有他的新疆，刘绍棠有他的京郊乡土，我有什么？”邓友梅打算写他的老北京。

老人的书房里，摆放着形色各异的烟壶，还有王习三先生以邓友梅夫妇的头像绘制的烟壶。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缘分。18岁的解放军文艺团成员邓友梅，朝气蓬勃，雄心壮志，改造腐朽的旧社会应该是他的使命所在。但是，邓友梅却被那些京城老玩意儿深深地吸引了。或许，这是一位作家的文化直觉，看到那么多精致的器具被乱七八糟地扔在旧货摊上，邓友梅感到了一种珍贵的传统的消失，他的痛感是那么强烈。因为喜欢，他开始搜集、研究它们的传承与历史，对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越发珍视。“对‘旧物’，对‘旧人’，他自始至终就反对得不够彻底——更多的是理解、尊重和反思。于是，有了1982年的《那五》，有了《烟壶》。邓友梅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京味小说’。”

从一位没读过几年书的文工团战士，成为一位风格独具的作家，邓友梅经历的坎坷波折不是一篇短短的文字所能容纳的。回首过往的岁月，邓友梅说，人一定要对社会有所贡献才能生存下去，而自己所能贡献的，惟有写作，这是从自己能力出发的一个认真选择。

难免要谈到今天的文学，他说要有信心。他希望今天的青年作家也能珍惜自己的选择，在纷扰的社会中沉下心来，体验社会，认知社会，把文学当做事业去追求。虽然读书的人少了，但是要相信将来一定有固定的读者群在阅读严肃的文学作品。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作家们最好有另外一份职业，尽量不要靠文学去谋生。

1956年3月，27岁的徐怀中由昆明北上抵京，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当时，他是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一名研究员，因为写出中篇《地上的长虹》等而小有名气。对于一个痴迷文学的青年来说，能被点名参加第一次“青创会”，徐怀中觉得“特别了不起”，他说，“部队里好多人想来，大部分都没争上名额，心里很不舒服，也有不服气的。”

那半个月，位于北京交道口的炒豆胡同变得热闹起来，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青年作者们都住在这儿，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家，邓友梅、刘绍棠、玛拉沁夫、从维熙、林斤澜、陆柱国等都在其中。就在大家忙着招呼致意、互相攀谈的时候，徐怀中却四处打听哪里有打字社。他着急，要把包里厚厚的一沓手稿变成铅字。这沓手稿，就是他的第一部部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后来，这部25万字的作品被看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引起了很大反响。

1956年的那次会议留给徐怀中的，恐怕就是“忙碌”，甚或“紧张”。他至今都记得，南长街的那家小打字社里，所有打字员都停下手头的活计帮他赶工。“就这么折腾了好几天，终于完成了。我把书稿整理好，寄给好多人看，让他们提意见。当时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老编辑；寄给我在部队的领导冯牧先生，他很重视培养青



1956年青创会代表徐怀中：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本报记者 李晓晨

年作家，发现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名气比较大的有白桦、公刘等等；还有就是寄给我爱人，从我们结婚前，她就是我所有作品的第一个读者。”

小说先是在《解放军文艺》连载，后由青年出版社出版。叶圣陶看到这部作品后，写了一封长信给徐怀中，之后又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详细指出哪些词句用得不妥当。“那些老作家对我们青年作者的关怀真是让人感动，我跟叶老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往，他

当时那么认真地阅读我的作品，给我提修改意见，真是很难得。我一直很遗

憾直到他去世我都没能登门拜访。”

徐怀中不紧不慢地回忆着往事，几十年前的细节历历在目。第一次“青创会”的会场设在北京饭店，许多老作家被请来做报告，大家听得若有所思，讨论得煞是热闹；老舍等来跟青年作者们聚会、联欢，大家争着往前挤，想跟他们说句话、握手；出版社、报社的人整天往会场跑，忙着采访、约

稿……那时候，文学是人们心中不灭的火光，点亮了每一个黯淡的角落，也因此，在当时的青年人看来，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现在回想起来，5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青年人的思想都很简单，很单纯，对生活充满热情。国家也很重视文学，部队给了我们很大的创作空间，基本上你写什么都行。当然，那时候生活的条件都很艰苦，我们都是业余时间搞创作，晚上亮一盏小油灯，一刮风，纸上全是沙子。但也就是在那时，我写了5个短篇、1个中篇、1个长篇和1个剧本，算是创作的一个小高潮。1956年到北京开完会没多久，我就加入了中国作协，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没有人总是提“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但他们的青春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同国家的建设、人民的苦痛融合在一起。上世纪50年代，徐怀中作为工兵部队的一名连队指导员赴西藏支援边疆建设，修建从西康到拉萨的康藏公路。部队驻扎在昌都附近，周围高山环绕，海拔5000多米，昼夜温差极大，早上醒来头发常常被冻在帐篷上，他就用手把冰敲碎，然后再起床。没有人觉得辛苦，一切都顺理成章。他说，自己在西康到拉萨的所有农业技术推广站都住过，学会了开拖拉机、播种、收割。“我们真是把年轻人对西藏那片土地的感情一同播种了下去，所以我的小说题目叫《我们播种爱情》。不是下

去随便采访几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一待，就能写出个东西来”。从拉萨回昆明的路上经过一个书摊儿，他凑上去，瞥见一本书有些眼熟——是他的《地上的长虹》，他一高兴，索性全都买下来。可能，摊主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个大方的年轻战士正是小说的作者。

眼下，84岁的徐怀中与夫人安静相守，他的主要精力还是都花在创作上，“还想写一本书，但有些犹豫、纠结”。怕时间不够用，所以格外惜时。我问，能不能对现在的青年作家说些什么。他略作停顿，几分为难：“说实话，我对青年作家的创作缺乏整体把握，所以，怕说得不合时宜，显得故作姿态。”再问，能给部队的作家提点建议吗？又摆手：“年龄大了，又没有时间细读别人的作品，就不建议了吧。”他固执的“不配合”里流露出率真和自然。

我理解他不愿多说的思忖，便请他以自己的文学感悟作为结束。本来轻松的话题却压力重重，他左思右想，最终留下这样几句：“这辈子经历了太多事情，年老之后，许多想法与之前相去甚远。像我这样的老人家，重要的不是再去学多少东西，探索什么新的路子。重要的，是剥离掉原来的一些陈旧观念，剥离得越干净，越可能写出新的、有锋芒的东西。我仍然需要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摆脱这么多年来形成的有形无形的文学上的禁锢，回到文学的规律上去，回到艺术本身。”



1956年青创会代表玛拉沁夫：
□本报记者 明江

青年文学创作者的一代风景

会议在东交民巷团中央礼堂召开，有一天晚会上周恩来总理到来，在来宾休息室问我：这次大会来开会的都有哪些人？哪些人我可以找来跟他们谈一谈？

我说：有写了《不能走那条路》的李准；有写了《活人塘》的陈登科，他原来是大字不识的战士；还有少数民族作家玛拉沁夫，他是蒙古族人。

周总理说：好！我就找这个玛拉沁夫谈一谈。

那一天晚上正在举行联欢会，突然有人拍玛拉沁夫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张僖打手势让他出来。他俩默默走过一个很长的走廊，玛拉沁夫被让进了一间来宾休息室。走进室内的玛拉沁夫绕过门口的屏风，突然看见了周恩来总理站在那里，向他伸出了手。

一下紧张得发蒙的玛拉沁夫顿时满头大汗，急忙走过去躬身用双手握住周总理的手问好。

当时和总理的很多交谈内容，玛拉沁夫仍然清楚地记得——

周总理握着我的手问：“哎，玛拉沁夫，你汉语怎么讲得这么好啊？”我连忙回答说：“我年纪小就参加革命，一直跟汉族同志在一起……”周总理让我跟他走过去坐在沙发上，继续刚才的话题：“你学会汉语很好啊，我历来主张少数民族同志要学汉语，不但可以与汉族同志进行交流，而且也可以通过汉语与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交流，甚至可以进行国际交流，所以我主张少数民族同志要学会、学好汉语。”

我完全同意总理的教导，不停地点头说：“是，是……”

总理话锋一转，提高声音又说：“同时，我周恩来一再说过，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同志，要学会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这样做不只是为了便于交流，更重要的是表达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各民族之间要相互尊重，只有互相尊重，才能真正团结，团结好了才能齐心协力，共同建设国家。”

总理了解了我深入生活的情况后，便关心地问起了到草原基层时是走路还是骑马。我回答说，牧区新来的干部一到，就发给240元钱，叫我们自己去买乘骑。草原辽阔，靠走路，误事。总理一听，高兴地笑着说：“对，对，马跑总是比人走快嘛！”说得我也第一次轻松地笑了……

岁月流逝，作为一个文坛老兵，玛拉沁夫经历了很多，他现在依然才思敏捷、身笔双健，对当今文学状况和社会生活有着独到深刻的观察与理解，但他不愿意对青年进行简单的说教，“敬畏文学、感恩人民、忠于祖国”，是玛拉沁夫对新一代青年作家们的寄语，这里包含了他对经历岁月的沉思，以及对生活与文学的深情期待。

玛拉沁夫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的领导集体，以大智大勇之势，率领全国各族人民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和新举措，全国人民正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新一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召开，恰逢其时，意义重大。让我们担当起历史重任，在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胜利前进，去创造中国文学新的辉煌。

致青年

郭沫若

青年是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就是进步的象征。人类社会乃至一切自然界的进化关键，可以说就操持在青年的手里。宇宙中举凡运行的轨迹都呈抛物线形，近来已由物理学家证明，连太阳光线从前以为是直线进行的，其实也是采取曲线的行径。年有春夏秋冬，人有幼少壮老，都同样是抛物线形的轨迹。假使没有明年的春夏，万物便只好永远地死亡，假使没有第二代的青年，人类的一切便只好永远地哀歌。青年哟，人类的春天！就靠着这青春的一季，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进行到抛物线的顶端；也就靠着有这不断的青春的来复，使我们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精神发展，永远保持着上升的阶段。前一代的抛物线顶端成为后一代抛物线的起点。向上的波澜，一波未平，一波继起，就这样使必趋没落的抛物线变为永进发展的无穷曲线。自然及人类是这样进化了来，也将这样进化下去。……我们希望，“五四”运动所表现的那种磅礴的青年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而今后无数的青年都要保持着“五四”运动的朝气向前跃进。继承“五四”，推进“五四”，超过“五四”，使青年永远文化化，文化永远青年化。

茅盾

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因此，作品中就必须写到环境。作品中的环境描写，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作家常常要从各方面来考虑，在怎样的场合应该有怎样的环境描写。不适当的环境描写会破坏作品的完整性，至少也要破坏作品的气氛。一段风景描写，不论写得如何动人，如果只是作家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欣赏，而不是通过人物的眼睛、从人物当时的思想情绪，写出人物对于风景的感受，那就会变成没有意义的点缀。风景（或其他自然现象）的描写，和室内的装饰布置的描写，时常被用来加强特定的气氛。而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会认为正面的渲染方法不如对比的手法能够产生更强烈的效果。烦恼的人恰恰落进作乐的场合，表面上不得不强颜欢笑，心里却加倍痛苦——这在作品中是常常看到的，在生活中也常常看到，不过，由于作家的加工，作品中所表现的，比在生活中所发生的，就要强烈得多。

巴金

前两天我意外地遇见一位江苏的青年作家。她充满自信，而且很有勇气。她不是为写作而写作，她瞧不起“文学商人”，那些看“行情”、“看风向”的作家。她满脑子并没有资历、地位、名望等东西，我在她的眼里也不过是一个小老头子。这是新一代作家，她（他）们昂着头走上文学的道路，要坐上自己应有的席位。他们坦率、朴素、真诚，毫无等级的观念，也不懂得“唯唯诺诺”。他们并不要求谁来培养，现实生活培养了他们。可能有人觉得他们“不懂礼貌”，看他们来势汹汹，仿佛逼着我们让路。然而说句实话，我喜欢他们，由他们来接班我放心。“接班”二字用在这里并不恰当，绝不是我们带着他们、扶他们缓步前进；应当是他们推开我们，把我们甩在后面。

老舍

后写的作品比不上第一篇的原因，我的确知道，并不都因为骄傲自满。我知道：第一篇是集中所有的精力与生活经验写出来的，所以值得发表而被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发表以后，约稿者闻名而至，纷纷邀请撰写。于是，作者的准备时间既不充足，生活经验也欠充实，而勉强成篇，无暇多改，所以第二篇就不如第一篇好。即使勇于改正，屡屡加工，怎奈内容原欠充实，先天不足，改来改去也终无大用。我自己就犯过，而且还在犯这个毛病。我们必须更加严肃，不要以为第一篇既已成功，第二篇就可以一挥而就，于是对约稿者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不，不该这样。我们必须更严肃认真，不轻易答应约稿者的要求。我们须看清楚，一篇作品的成功并不能保证第二篇也照样美好。顺便地说，约稿者也该更严肃些，不要为夸示拉稿的能力而把新作家搞垮。为鼓舞青年们创作，我们应当以量求质，不宜要求太高。但是由青年作家自己来说，文艺的增产似乎不应包括“降低成本”。不，我们应该要求自己每篇作品都不惜工本，保证质量。

曹禺

我是一个写话剧的，我深深感觉到戏剧比起其他的文艺形式来，有它独特的限制。这种限制使我知道戏剧究竟不同于小说、散文，它的容量是有限的，但是它同样可以表现深刻的思想。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作者，他企图在一出戏里表现出很多的思想，时常把主题弄得过分复杂，人物、故事也因而要排得很多。舞台上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常常使观众眼花缭乱，忙不过来，对戏里一个一个的思想和问题不能有一点从容的心情好好地接受。戏演完了，观众感觉到：“我受了一场很大的教育。”但是，谁也说不明白他自己究竟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在我们写戏的时候，第一，不要在一个戏里塞进太多的主题，弄得头绪繁杂，无从理会。第二，要在创作的工作中，即深入生活和对生活进行深入思考的过程里，让主题从有血有肉的人物和充满了生活气息的事件里逐渐有机地生长出来。不要匆匆忙忙抓住了一个主题就写，并且扼住它，不许它生长变化。